



古史

(北宋) 苏辙 著

舒大刚

尤潇潇 校点

舒星

总编纂 舒大刚

《巴蜀全书》编纂领导小组 组织



四川大学出版社

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巴蜀全書》（10@ zh00

四川省重大文化工程《巴蜀全書》（川宣〔2012〕110號）

古 史

（北宋）蘇 轍 著

舒大剛 舒 星 尤瀟瀟 校點



四川大學出版社

責任編輯:何 靜
責任校對:周 穎
封面設計:經典記憶文化 鄒小工
責任印製:王 煒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古史 / (北宋) 蘇轍著; 舒大剛, 舒星, 尤瀟瀟校點. —成都: 四川大學出版社, 2016. 9

(巴蜀全書 / 舒大剛主編)

ISBN 978-7-5614-9962-7

I. ①古… II. ①蘇… ②舒… ③舒… ④尤…
III. ①中國歷史—古代史—紀傳體 IV. ①K204.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 (2014) 第 240691 號

書名 古 史 GU SHI

著 者	(北宋)蘇 轍
校 點	舒大剛 舒 星 尤瀟瀟
出 版	四川大學出版社
地 址	成都市一環路南一段 24 號 (610065)
發 行	四川大學出版社
書 號	ISBN 978-7-5614-9962-7
印 刷	四川和樂印務有限責任公司
成品尺寸	185 mm×260 mm
印 張	31.75
字 數	673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定 價	198.00 圓



版權所有◆侵權必究

◆讀者郵購本書,請與本社發行科聯繫。

電話:(028)85408408/(028)85401670/
(028)85408023 郵政編碼:610065

◆本社圖書如有印裝質量問題,請
寄回出版社調換。

◆網址:<http://www.scupress.net>

《巴蜀全書》出版說明

《巴蜀全書》是收錄和整理巴蜀歷史文獻的大型叢書。該項工作二〇一〇年一月經由中共四川省委常委會議批准為四川省重大文化工程；同年四月又獲國家哲學社會科學規劃辦公室批准，列為國家社科基金重大委託項目。該計劃將對現今四川省、重慶市及其週邊亦屬傳統“巴蜀文化”區域內的各類古典文獻進行系統調查、整理和研究，實現對巴蜀文獻有史以來規模最大、體例最善、編纂最科學、使用最方便的著錄和出版。

《巴蜀全書》編纂工程，將收集和整理自周秦以下乃至民國初年歷代巴蜀學人撰著的重要典籍以及其他作者撰著的反映巴蜀歷史文化的作品，編纂彙集成巴蜀文獻的大型叢書。主體工作將分“巴蜀文獻聯合目錄”“巴蜀文獻精品集萃”“巴蜀文獻珍本善本”三大類型，計劃對兩千餘種巴蜀文獻編製聯合目錄和內容提要，對五百餘部、二十餘萬篇巴蜀文獻進行精心校點或注釋、評析，對一百餘種巴蜀善本、珍本文獻進行考察和重版。

通過編纂《巴蜀全書》，希望打造出巴蜀文化的“四庫全書”，為保存和傳播巴蜀歷代的學術文化成果，促進當代“蜀學”振興與巴蜀文化建設，奠定堅實的文獻基礎；為提升中華民族的文化自覺和文化自信、建設文化強國貢獻力量。

《巴蜀全書》編纂領導小組

整理巴蜀文獻 傳承優秀文化

——《巴蜀全書》前言

舒大剛 萬本根

中華民族，多元一體；中國文化，羣星璀璨。在祖國大西南，自古就傳承着一脈具有深厚歷史底蘊和鮮明個性的文化，即巴蜀文化。巴蜀地區山川秀麗，物產豐富，自古號稱“陸海”“天府”；巴蜀文化源遠流長，內涵豐富，是古代長江文明的源頭，與“齊魯文化”“荆楚文化”“吳越文化”等同為中華文化之瑰寶。整理和研究巴蜀文化的載體——巴蜀文獻，因而成為研究中國歷史和中華文化不可或缺的內容。

一、綜覽巴蜀文化 增強自信熱力

巴蜀地區氣候宜人，資源豐富，是人類早期的發祥地之一。考古發現，這裏有距今二百零四萬年的“巫山人”，有距今三萬五千年的“資陽人”。這裏不僅有大禹治水、巴族廩君、蜀國五主（即蠶叢、柏灌、魚鳧、杜宇、開明五個王朝）等優美動人的歷史傳說，也有寶墩文化諸古城遺址、三峽考古遺址、三星堆遺址、金沙遺址、小田溪遺址、李家壩遺址等重大考古發現。商末周初，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以及勇銳的巴師，曾參與武王伐紂。春秋戰國，巴濮楚鄧、秦蜀苴羌，雖互有戰伐，亦相互交流。秦漢以降，巴蜀的地利和物產，更是抵禦強侮、周濟天下、維護祖國統一、實現持久繁榮的戰略屏障和天然府庫。

在祖國“多元一統”的文化格局中，巴蜀以其豐富的自然和人文資源，哺育出一批又一批傑出人物和文化精英，既有司馬相如、王褒、嚴遵、揚雄、陳壽、常璩、陳子昂、趙蕤、李白、蘇軾、張栻、李心傳、魏了翁、虞集、楊慎、唐甄、李調元、楊銳、劉光第、廖平、宋育仁、謝無量、郭沫若、巴金等文化巨擘，也有朱之洪、張瀾、謝持、張培爵、吳玉章、楊庶堪、黃復生、尹昌衡、鄒容、熊克武、朱德、劉伯承、聶榮臻、陳毅、趙世炎、鄧小平等革命英傑，他們超拔倫輩，卓然振起，敢為天下先，樂為蒼生謀，創造了輝煌燦爛的思想文化，也推動了中國社會的歷史巨變，演繹了一幕幕驚心動魄的歷史大劇。

歷代巴蜀學人在祖國文化的締造中，成就良多，表現突出，許多文化人物和文明成果往往具有先導價值。巴蜀兒女銳意進取的創新精神，使這種創造發明常常居於全國領先地位，成為祖國文化寶庫中耀眼的明珠。

在傳統思想、文化和宗教領域，中國素號“三教互補”，“儒”“釋”“道”交互構

成中華思想文化的主要內容，而儒學是其主幹。從漢代開始，巴蜀地區的儒學就十分發達，西漢蜀守文翁在成都創建當時全國首個郡國學校——石室學宮，推行“七經”教育，實行儒家教化，遂使蜀地民風丕變，並化及巴、漢，促成中國儒學重要流派——“蜀學”的形成，史有“蜀學比於齊魯”之稱。巴蜀地區是“仙道”派發源地，東漢張陵在蜀中創立“天師道”，中國道教正式誕生。東漢佛教傳入中國後，四川也是其重要傳播區域。

巴蜀“易學”源遠流長，大師輩出。自漢胡安（居邛崃白鶴山，以《易》傳司馬相如）、趙賓（治《易》持論巧慧，以授孟喜）、嚴遵（隱居成都，治《易》《老》）、揚雄（著《太玄》）而下，巴蜀治《易》之家輩出。晉有范長生（著《周易蜀才注》），唐有李鼎祚（著《周易集解》），宋有蘇東坡（著《東坡易傳》）、房審權（撰《周易義海》）、魏了翁（撰《周易集義》《周易要義》）、張栻（著《南軒易說》）、李石（著《方舟易說》）、李心傳（著《丙子學易編》），元有趙采（著《周易程朱傳義折衷》）、黃澤（著《易學濫觴》）、王申子（著《周易輯說》），明有來知德（撰《周易集注》）、熊過（著《周易象旨決錄》），清有李調元（著《易古文》）、劉沅（撰《周易恒解》），皆各撰易著，發明“四聖”（伏羲、文王、周公、孔子）之心。巴蜀易學，普及面廣，自文人雅士、方術道流，以至引車賣漿之徒、箍桶織履之輩，皆有精於易理、善於測算者。理學大師程頤兩度入蜀，得遇奇人，遂有感悟，因生“易學在蜀”之歎。

巴蜀“史學”名著迭出、斐然成章。陳壽《三國志》雅潔典要，名列“前四史”；常璩《華陽國志》體大思精，肇開方志體。譙周《古史考》，開古史考證之先聲；蘇轍《古史》，成舊史重修之名著。至於范祖禹（撰《唐鑑》，助司馬光修《通鑑》）、李燾（撰《續資治通鑑長編》）、王偁（撰《東都事略》）、李心傳（撰《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及《朝野雜記》《宋會要》），更是宋代史學之巨擘，故劉咸忻有“史學莫隆於蜀”之說。

蜀人“好文”，巴蜀自古就是歌賦詩詞的沃壤。禹娶塗山（今重慶南岸真武山，常璩《華陽國志·巴志》、酈道元《水經注·江水一》），而有“候人兮猗”的“南音”，周公、召公取之“以為《周南》《召南》”（《呂氏春秋·音初》）。西周江陽（今瀘州）人尹吉甫亦善作詩，《詩經》傳其四篇（曹學佺《蜀中廣記》卷九一）。“文宗自古出巴蜀”，“漢賦四家”，司馬相如、揚雄、王褒居其三。陳子昂、李太白首開大唐雄健浪漫詩風，五代後蜀《花間集》與北宋東坡詞，開創宋詞婉約、豪放二派。“三蘇”（蘇洵、蘇軾、蘇轍）父子，同時輝耀於“唐宋八大家”之林；楊慎著作之富，位列明代儒林之首。“自古詩人例到蜀”，漢晉唐宋以及明清，歷代之遷客騷人，多以巴蜀為理想的避難樂土，而巴蜀的山水風物又豐富其藝情藻思，促成創作高峰的到來。杜甫、陸游均以巴蜀為第二故鄉，范成大、王士禛亦寫下千古流芳的《吳船錄》和《驛程記》。洎乎近世，沫若、巴金，蔚為文壇宗匠；蜀謳川劇，技壓梨園羣芳。

“三蘇”父子既是文學大家，也是“蜀學”領袖；綿竹張栻，不僅傳衍南宋“蜀學”之道脈，而且創立“湖湘學派”之新範。明末唐甄撰《潛書》，斥責專制君主，提倡民本思想，被章太炎譽為“上繼孟、荀、陽明，下啟戴震”的一代名著。晚清廖平

撰書數百種，區分今學古學，倡言託古改制。錢基博、范文瀾俱譽其為近代思想解放之先驅。新都吳虞，批判傳統道德，筆鋒犀利，被胡適譽為“思想界的清道夫”。

在科技領域，秦蜀守李冰開建的都江堰，是至今還在使用的人類最古老的水利工程；漢代臨邛人民，開創了人類歷史上最早使用天然氣煮鹽的記錄。漢武帝徵閬中洛下閎修《太初曆》，精確計算回歸年與朔望月，是世界上首部“陰陽合曆”的範本。楊子建《十產論》異胎轉位術領先歐洲五百年。北宋唐慎微《證類本草》，將本草學與方劑學相結合，是世界上第一部大型藥典和植物志。王灼《糖霜譜》詳錄蔗糖製作工藝，是世界上有關製糖技術的首部專書。南宋秦九韶《數學九章》，將中國數學推向古代科學頂峰，其“大衍求一術”領先西方世界同類算法五百年。

至於巴蜀地區的鄉村建設和家族文化，也是碩果累累，佳話多多。他們或夫婦齊名、比翼雙飛（司馬相如與卓文君，楊慎與黃娥）；或兄弟連袂，花萼齊芳（蘇軾、蘇轍，蘇舜欽、蘇舜元，李心傳、李道傳、李性傳等）。更有父子祖孫，世代書香，奕世載美，五世其昌：閬中陳省華及其子堯佐、堯叟、堯咨等，“一門二相，四世六公，昆季雙魁多士，仲伯繼率百僚”（霍松林語）；眉山蘇洵、蘇軾、蘇轍及子孫輩過、籀，並善撰文，號稱“五蘇”；梓州蘇易簡及其孫舜欽、舜元，俱善詩文，號稱“潼山三蘇”；井研李舜臣及其子心傳、道傳、性傳，俱善史法、道學，號稱“四李”；丹稜李燾與其子壁、堽，俱善史學、文學，時人贊“前有三蘇，後有三李”。降及近世，雙流劉沅及其孫咸榮、咸炘、咸煥，長於經學、道學與史學，號稱“槐軒學派”。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綜觀巴蜀學術文化，真可謂文章大雅，無奇不有！其先於天下而創者，則有導夫先路之功；其後於天下而作者，則有超邁古今之效！先天後天，不失其序；或創或繼，各得其宜。

二、整理巴蜀文獻 促進文化興邦

歷史上的四川，既是文化大省，也是文獻富省。巴蜀上古歷史文化，在甲骨文、金文和《尚書》《春秋》等華夏文獻中都有記錄，同時巴蜀大地還孕育形成了別具特色的“巴蜀文字”。秦漢統一後，歷代巴蜀學人又為我們留下了汗牛充棟、豐富多彩的古典文獻。唐代中後期（約八世紀初），成都誕生了“西川印子”，北宋初期（十世紀後期）又出現了“交子雙色印刷術”，標誌着雕版印刷的產生、成熟和創新，大大推動了包括巴蜀文獻在內的古典文獻的保存與傳播。據不完全統計，歷史上產生的巴蜀古文獻不下萬餘種，現在依然存世的也在五千種以上。

巴蜀文獻悠久綿長，影響深遠，上自先秦的陶字、金文，下迄漢晉的竹簡、石刻，以及唐刻、宋槧，明刊、清校，經史子集，三教九流，歷歷相續不絕，熠熠彪炳史冊。巴蜀文獻體裁多樣，內容豐富，舉凡政治之興替、經濟之發展、文化之繁榮、兵謀之奇正、社會之變革，以及思想學術之精微、高人韻士之風雅、地理民族之風貌、風俗習慣

之奇特，都應有盡有，多彩多姿。它們是巴蜀文化的載體，也是中華文明的重要表徵。

對巴蜀文獻進行調查整理研究，一直是歷代巴蜀學人的夢想。在歷史上，許多學人曾對巴蜀文獻的整理和出版付出過熱情和心血，編纂有各類巴蜀總集、全集和叢書。《漢書·藝文志》載“‘揚雄所序’三十八篇：《太玄》十九、《法言》十三、《樂》四、《箴》二”。或許是巴蜀學人著述的首次彙集。五代的《花間集》和《蜀國文英》，無疑是輯錄成都乃至巴蜀作品的最早總集。宋代逐漸形成了“東坡七集”（蘇軾）、“樂城四集”（蘇轍）、“鶴山大全集”（魏了翁）等個人全集，以及《三蘇文粹》《成都文類》等文章總集。明代出現楊慎的個人全集《升庵全集》和四川文章總集《全蜀藝文志》。入蜀為官的曹學佺還纂有類集巴蜀歷史文化掌故而成的資料大全——《蜀中廣記》。清代，李調元輯刻以珍稀巴蜀文獻為主的《函海》，可視為第一部具體而微的“巴蜀文獻叢書”。近代編有各類“蜀詩”“蜀詞”“蜀文”和“川戲”等選集。這些都為巴蜀文獻的系統編纂、出版做出了有益嘗試。

二十世紀初，謝無量曾提出編纂《蜀藏》的設想，因社會動盪而未果。胡淦亦擬編《四川叢書》，然僅草成“擬收書目”一卷。一九八三年中共中央《關於整理我國古籍的指示》下達，國家成立“全國古籍整理出版規劃領導小組”和“全國高等院校古籍整理工作委員會”，四川也成立了“四川省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製定出《四川省古籍整理出版規劃》（一九八四—一九九〇）。可惜這個規劃並未完全實施，巴蜀文獻仍然處於分散收藏甚至流失毀損的狀態。

二〇〇七年初，國務院下發《關於進一步加強古籍保護工作的意見》，全國各省紛紛編纂地方文獻叢書。四川大學和四川省社科院的學人再度燃起整理鄉邦文獻的熱情，向四川省委、省政府提交“編纂《巴蜀全書》，振興巴蜀文化”的建議，四川省委、省政府再度將整理巴蜀文獻提到議事日程。經過多方論證研究，二〇一〇年一月四川省委常委會議批准“將四川大學申請的《巴蜀全書》納入全省古籍文獻整理規劃項目”；四月又獲得國家哲學社會科學規劃辦公室批准，將《巴蜀全書》列為“國家社科基金重大委託項目”。千百年來巴蜀學人希望全面整理鄉邦文獻的夢想終於付諸實施。

《巴蜀全書》作為四川建省以來最大的文獻整理工程，將對自先秦至民國初年歷代巴蜀學人的著作或內容為巴蜀文化的文獻進行全面的調查收集和整理研究，並予以出版。本工程將採取以下三種方式進行：

一是編製《巴蜀文獻聯合目錄》。古今巴蜀學人曾經撰有大量著作，這些文獻在歷經了歷史的風風雨雨後，生滅聚散，或存或亡，若隱若現，已經面目不清了。該計劃根據“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的旨趣，擬對巴蜀文獻的歷史和現狀進行全面普查和系統考證，探明巴蜀文獻的總量、存佚、傳承和收藏情況，以目錄的方式揭示巴蜀文獻的歷史和現狀。

二是編纂《巴蜀文獻精品集萃》。巴蜀文獻，汗牛充棟，它們是研究和考述巴蜀歷史文化的重要資料。對這些文獻，我們將採取三種方式處理：首先，建立“巴蜀全書網”，利用計算機和網絡技術對現存巴蜀文獻進行掃描和初步加工，建立“巴蜀文獻全文資料庫”，向讀者和研究者提供儘可能集中的巴蜀文化資料。其次，本着“去粗取

精，古為今用”的宗旨，按照歷史價值、學術價值、文化價值“三結合”的原則，遵循時間性、代表性、地域性、獨特性“四統一”的標準，從浩繁的巴蜀古籍文獻中認真遴選五百餘種精品文獻，特別是要將那些在中華傳統文化體系中具有首創性和獨特性的巴蜀古籍文獻彙集起來，進行校勘、標點或注釋、疏證，挖掘其中的思想內涵和治蜀經驗，為當代社會、經濟、政治、文化建設服務。第三，根據巴蜀文化的歷史實際，收集各類著述和散見文獻，編成儒學、佛學、道教、民族、地理、文學、藝術、科技、碑刻等專集。

三是重版《巴蜀文獻珍本善本》。成都是印刷術發祥地，巴蜀地區自古以來的刻書、藏書事業都很發達，曾產生和收藏過數量眾多的珍本、善本，“蜀版”書歷來是文獻家收藏的珍品。這些文獻既是見證古代出版業、圖書館業發展的實物，也是進行文獻校讎的珍貴版本，亟待開發，也需要保護。本計劃將結合傳統修復技藝和現代印刷技術，對百餘種巴蜀文獻珍稀版本進行修復、考證和整理，以古色古香的方式予以重印。

通過以上三個系列的研究，庶幾使巴蜀文獻的歷史得到彰顯，內涵得到探究，精華得到凸顯，善本得到流通，從多個角度實現對巴蜀文獻的當代整理與再版。

盛世修書，傳承文明；蜀學復興，文獻先行。“《巴蜀全書》作為川版的‘四庫全書’，蘊含着歷代巴蜀先民共同的情感體驗和智慧結晶，昭示着今天四川各族人民共有的文化源流和精神家園。”（《巴蜀全書》編纂領導小組會議文件。下同）《巴蜀全書》領導小組要求，“我們一定要從建設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打牢四川人民團結奮鬥共同思想基礎的高度，來深刻認識《巴蜀全書》編纂出版工作的重大意義。特別要看到，這不是一件簡單的古籍整理出版工作，而是一件幾百年來巴蜀學人一直想做而沒有條件做成的文化盛事，是四川文化傳承史上的重要里程碑”。無論是中國古代的文化發展，還是世界近世的文明演進，都一再證明：任何一次大的文化復興活動，都是以歷史文獻的系統收集整理為基礎和先導的。我們希望通過對巴蜀文獻的整理出版，給巴蜀文化的全面研究和當代復興帶來契機，為“發掘和保護我國豐厚的歷史文化遺產，提升我國文化軟實力，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走向世界”做一些基礎性工作。

有鑒於此，《巴蜀全書》領導小組明確要求，要廣泛邀請省內外專家學者參與編纂，共襄盛舉。這一決策，實乃提高《巴蜀全書》學術水準和編纂質量的根本保障。領導小組還希望從事此項工作的學人，立足編纂，志在創新，從文獻整理拾級而上，自編纂而研究，自研究而弘揚，自弘揚而創新，“利用編纂出版《巴蜀全書》這個載體，進一步健全研究巴蜀傳統文化的學術體系，以編促學、以纂代訓，大力培養一批精通蜀學的科研帶頭人和學術新人”。可謂期望殷切，任務艱巨，躬逢其盛，能不振起？非曰能之，唯願學焉。《巴蜀全書》的編纂希望為巴蜀的文化建設和“蜀學”的現代復興擁護前趨，至於搭建橋梁，開闢荊榛，上繼前賢，下啟來學，固非區區之所能，在此僅樹其高標，以俟高明云爾！

二〇一四年五月

目 錄

古史叙錄	1
古史自叙	3
本紀七	
古史卷一	5
三皇本紀第一	5
古史卷二	7
五帝本紀第二	7
古史卷三	13
夏本紀第三	13
古史卷四	18
殷 ^① 本紀第四	18
古史卷五	24
周本紀第五	24
古史卷六	39
秦本紀第六	39
古史卷七	56
秦始皇本紀第七	56
世家十六	
古史卷八	71
吳太伯世家第一	71
古史卷九	78
齊太公世家第二	78
古史卷十	91
魯周公世家第三	91
古史卷十一	107
燕召公世家第四	107

① 殷：原目錄作“商”，正文作“殷”，從正文改。

古史卷十二	112
蔡叔曹叔世家第五	112
古史卷十三	118
陳杞世家第六	118
古史卷十四	125
衛康叔世家第七	125
古史卷十五	135
宋微子世家第八	135
古史卷十六	145
晉唐叔世家第九	145
古史卷十七	167
楚世家第十	167
古史卷十八	193
鄭世家第十一	193
古史卷十九	204
越 ^① 世家第十二	204
古史卷二十	209
趙世家第十三	209
古史卷二十一	228
魏世家第十四	228
古史卷二十二	242
韓世家第十五	242
古史卷二十三	250
田敬仲世家第十六	250
列傳三十七	
古史卷二十四	262
伯夷列傳第一	262
古史卷二十五	264
管晏列傳第二	264

① 越世家：原目錄作“越王勾踐”，正文作“越世家”，從正文改。

古史卷二十六	269
柳下惠列傳第三	269
古史卷二十七	271
曹子臧吳季札列傳第四	271
古史卷二十八	274
晉范文子列傳第五	274
古史卷二十九	276
晉叔向列傳第六	276
古史卷三十	280
鄭子產列傳第七	280
古史卷三十一	284
孔子列傳第八	284
古史卷三十二	295
孔子弟子列傳第九	295
古史卷三十三	315
老子列傳第十	315
古史卷三十四	322
孟子孫卿列傳第十一	322
古史卷三十五	327
伍員列傳第十二	327
古史卷三十六	330
孫武吳起列傳第十三	330
古史卷三十七	334
范蠡大夫種列傳第十四	334
古史卷三十八	338
葉公列傳第十五	338
古史卷三十九	341
商君列傳第十六	341
古史卷四十	346
蘇秦列傳第十七	346
古史卷四十一	358
張儀列傳第十八	358

古史卷四十二	370
樗里子甘茂列傳第十九	370
古史卷四十三	376
穰侯列傳第二十	376
古史卷四十四	380
白起王翦列傳第二十一	380
古史卷四十五	386
孟嘗君列傳第二十二	386
古史卷四十六	392
平原君列傳第二十三	392
古史卷四十七	395
魏公子列傳第二十四	395
古史卷四十八	399
春申君列傳第二十五	399
古史卷四十九	404
范雎蔡澤列傳第二十六	404
古史卷五十	415
樂毅列傳第二十七	415
古史卷五十一	419
廉頗藺相如列傳第二十八	419
古史卷五十二	425
田單列傳第二十九	425
古史卷五十三	428
屈原列傳第三十	428
古史卷五十四	431
虞卿魯仲連列傳第三十一	431
古史卷五十五	438
呂不韋列傳第三十二	438
古史卷五十六	441
李斯列傳第三十三	441
古史卷五十七	452
蒙恬列傳第三十四	452

古史卷五十八	455
扁鵲列傳第三十五	455
古史卷五十九	458
刺客列傳第三十六	458
古史卷六十	466
滑稽列傳第三十七	466
書 後	470
附 錄	471
後 記	491

古史叙錄

蘇轍（一〇三九—一一一〇），字子由，一字同叔，號樂城，晚號穎濱遺老，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人。年十九，與兄軾同登進士第，後又同舉制科，可謂少年得意。然仕途卻相當曲折，熙寧新政中，曾入制置三司條例司，後因政見不和，忤王安石意而出朝，輾轉地方，沉淪下僚十數年。又連坐其兄“烏臺詩案”，貶監筠州鹽酒稅。哲宗立，高太后聽政，召返京師，累官至尚書右丞，進門下侍郎。哲宗親政，復見斥，貶居筠州、雷州、循州。徽宗繼位，遇赦北歸，寓居穎川，以大中大夫致仕。卒年七十四，追復端明殿學士，謚“文定”。一生著述頗豐，除《古史》外，尚有《詩集傳》《春秋集解》《龍川略志》《龍川別志》《樂城集》等。

是書創作之由，轍在《古史序》中有詳盡說明：“太史公始易編年之法爲本紀、世家、列傳，記五帝三王以來，後世莫能易之。然其爲人淺近而不學，疏略而輕信……故其記堯舜三代之事，皆不得聖人之意。戰國之際，諸子辯士各自著書，或增損古事以自信一時之說，遷一切信之，甚者或采世俗相傳之語以易古文舊說。及秦焚書，戰國之史不傳於民間……幸而野史一二存者，遷亦未暇詳也，故其記戰國，有數年不書一事者。余竊悲之，故因遷之舊，上觀《詩》、《書》，下考《春秋》及秦漢雜錄，記伏羲、神農，訖秦始皇帝，爲七本紀、十六世家、三十七列傳，謂之《古史》，追錄聖賢之意，以明示來世，至於得失成敗之際，亦備論其故。”可見，蘇轍之發願重撰《古史》，乃是出於對司馬遷《史記》之不滿，他認爲司馬遷“淺近而不學，疏略而輕信”，《史記》所記五帝、三代之事，“皆不得聖人之意”；對於戰國時期的歷史，司馬遷依據“諸子辯士”各家著述，殊不知諸子之書多“增損古事以自信一時之說”，並非真實的歷史記錄，然卻“一切信之”，甚至“或采世俗相傳之語以易古文舊說”，在史料上也缺乏甄別。爲了體現“聖人之意”，建立信史體系，“明示來世”，反映古今“得失成敗”之際，蘇轍很早便立志要改寫《史記》。直到中年，乃成此書。可見他對此書傾注了大量心血，也寄託了深切的用心。

《古史》由七本紀、十六世家、三十七列傳組成，每一本紀、世家、列傳各爲一卷，凡六十卷。《古史》對《史記》做了全面的增補和考訂工作，首先是增加了三皇本紀及柳下惠、曹子臧、季札、范文子、叔向、子產、

范蠡、葉公、田單等列傳。其次是增加了許多《史記》沒有的史料，所依據的主要材料多來自《左傳》、《尚書》、《戰國策》，內容較《史記》更為豐富。第三，彌補和糾正了《史記》存在的某些疏略和訛舛，多見於其子蘇遜的夾注。元人盛如梓說：“《史記》初看，竊怪語多重複，事多夸誕，及看子由《古史》，刪除簡當，固為奇特。”^①清人王士禎在談到治史時也說：“史事自十七史外，如《史記》外則有蘇氏《古史》，前、後《漢書》外有荀悅、袁宏兩《漢紀》……凡此諸書，皆當兼收並采，不可以其不列學官而偏廢之。”^②

此外，《古史》還反映了宋代的學風，一是體現了宋儒疑古和好發議論的治史特點，二是推崇以道證史的治史旨趣，體現了義理化史學初興時期的特徵，這些在《古史》給每位人物或紀傳所寫的史論（蘇子曰）中有充分體現。朱熹對《古史》的評價甚高，如他對《古史序》所云古之聖人“其於為善，如水之必寒，如火之必熱；其於不為不善，如騶虞之不殺，如竊脂之不穀”數語贊不絕口，認為“於義理大綱領處，見得極分明，提得極親切，雖其下文未能盡善，然只此數句，已非近世諸儒所能及矣”^③，“竊以為，於此有以識之，則其達於聖賢不遠矣”^④。如果說朱熹在其理學思想的指導下陶熔諸家，將義理化史學推向極致的話，那麼，蘇轍《古史》對他無疑有着十分重要的影響。由此言之，無論是探索兩宋義理化史學的發展，還是研究兩宋史學思想的演變，《古史》均有其不可忽視的價值，值得我們重視。^⑤

本書有南宋浙刻本（臺北故宮博物院藏，近時影印為二函八冊）、明南京國子監萬曆三十九年（一六一一）刻本（北京國家圖書館收藏，《中華再造善本》影印為二函十六冊）、《四庫全書》本等。此次整理，係據臺灣影宋本為底本，而以影明本、《四庫全書》本參校。不當之處，識者教焉。

① 盛如梓：《庶齋老學叢談》卷上。

② 王士禎：《分甘餘話》卷一。

③ 朱熹：《晦庵集》卷五四《答趙幾道》。

④ 朱熹：《晦庵集》卷七二《古史餘論》。

⑤ 參張偉：《蘇轍與〈古史〉》，《史學史研究》2003年第3期。

古史自叙

蘇子曰：古之帝王皆聖人也。其道以無爲爲宗，萬物莫能嬰之。其於爲善，如水之必寒，如火之必熱；其於不爲不善，如騶虞之不殺，如竊脂之不穀。不學而成，不勉而得。其積^①之中者有餘，故其推之以治天下者，有不可得而知也。孔氏之遺書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天地萬物猶將賴之以存，而況於人乎？

自三代之衰，聖人不作，世不知本而馳騁於喜怒哀樂之餘，故其發於事業日以鄙陋，不足以睎聖人之萬一。雖春秋之際，王澤未竭，士生其間，習於禮義而審於利病，如管仲、晏子、子產、叔向之流，皆不足以知之。至於孔子，其知之者至矣，而未嘗言。孟子知其一二，時以告人，而天下亦莫能信也。陵遲及於秦、漢，士益以功利爲急，言聖人者皆以其所知億之。儒者留於度數，而智者溺於權利，皆不知其非也。

太史公始易編年之法爲本紀、世家、列傳，記五帝、三王以來，後世莫能易之。然其爲人淺近而不學，疏略而輕信。漢景、武之間，《尚書》古文、《詩》毛氏、《春秋》左氏皆不列於學官，世能讀之者少。故其記堯、舜、三代之事，皆不得聖人之意。戰國之際，諸子辯士各自著書，或增損古事以自信。一時之說，遷一切信之，甚者或采世俗相傳之語，以易古文舊說。及秦焚書，戰國之史不傳於民間，秦惡其議己也，焚之略盡。幸而野史一二存者，遷亦未暇詳也。故其記戰國，有數年不書一事者。

余竊悲之，故因遷之舊，上觀《詩》、《書》，下考《春秋》，及秦漢雜錄，記伏羲、神農，訖秦始皇帝，爲七本紀、十六世家、三十七列傳，謂之《古史》。追錄聖賢之遺意，以明示來世。至於得失成敗之際，亦備論其故。

嗚呼！由數千歲之後，言數千歲之前，其詳不可得矣。幸其猶有存也，而或又失之，此《古史》之所爲作也。

【附錄】

《朱子語類》卷一二四：論子由《古史》言“帝王以無爲宗”。因言：“佛氏

① 積：原本作“發”，從文淵閣《四庫全書》本（以下簡稱《四庫》本）改。